

五四七年

世紀評論

第二卷

第十一卷



日三十月九年六十三國民 版出六期星逢每

行印社版出紀世

二之號九巷條三門華西京南

世紀評論

社論
『學術獨立』的道路

專論

爲新外匯政策擔心！

算八字、看相、與中國政治

英國的社會安全計劃

台灣島與台灣海峽之地位價值

大上海都市計劃(書評)

『湖南的西北角』序言(文藝)

討論

民主時代的「保守秘密」

讀康永仁先生論對日貿易的看法有感

遠東基教會議

一週間

王外長出席聯合國大會

編輯後記



康永仁	邱昌渭	吳景超	沙學浚	張繼正	沈從文	李毅	周祖德
-----	-----	-----	-----	-----	-----	----	-----

元千三售實期本

公司工業



永利化學

中國造船機器有限公司

新造及修理
船舶橋樑鋼
架油池輸水
道及其他工程

營業種類

事務所

江蘇路一號金城大樓三〇九室

電話一〇八〇— 三九九〇—

工廠

楊樹浦底路海橋東復興島

電話二〇(二) 八一二〇五

主要出品

硫酸經廠

純鹼

阿尼尼

燒鹼

肥田粉

硫酸

江蘇省

總經理處

華東經銷處

上海四川路四一零號四樓

電話一六六一 一六五七

其他各經銷處

天津重慶廣州漢口等地

獨立客觀
超然現實

世紀評論

週刊

一 邇來物價上漲，印刷成本增高，茲特調整售價如下：

預訂

全年(四十八期) 十一萬元
半年(二十四期) 六萬元
三月(十二期) 三萬元

零售

每册 三千元

二 郵資

平寄 免

掛號 每册八百元

航平 每册附加六百元

航掛 每册附加一千三百元

三 同業批發一律七折，請逕向本社洽辦

社址：南京西華門三條巷九號之二
上海辦事處：北京路二五五號七樓

世紀出版社印行

南京西華門

三條巷九號之二

電話：二二八一五



上海辦事處

北京路二五五號七樓

印刷者：

南京 美吉印刷社



社論

「學術獨立」的道路

北京大學校長胡適，近對記者談話謂：中國高等教育之目的，應「走上一條爭取學術獨立道路，且於十年完成其初步。」胡氏以為以大量外匯供給官費私費留學學生，「即等於不承認自己學術獨立，若以此巨款分配國內幾所好學校，則可做到許多有益學術的事。」他的辦法是：我國為顧及本身環境，應以十年為期，由政府規定第一個五年全力幫助五個大學發展，即北大、清華、浙大、武大、中大，限期成為國內最好及世界有地位的大學。第二個五年再協助另外五個大學發展。「如此，」胡氏說，「十年之中，獨立學術，自可造成。」

胡氏希望政府以「全力」幫助幾個學校，使其在短期間內，成為世界有地位的大學，如果可以成功，自是一件好事，凡是中國人都應該贊許的。但胡氏用「獨立學術」一詞，實為不幸。學術本無國界，無論是那一個國家的學者所研究出來的成績，都是全世界學術界的公產，談不到甚麼獨立與不獨立。惟有希特拉的德國才以學術獨立相標榜，其結果是把許多第一流的學者、科學家、文藝家，驅逐出國，使德國失去學術上的領導地位。是的，我們不希望中國學術獨立，學術獨立是學術自殺最有效的方法。幾年以前我國曾有一部分人提倡所謂「本位文化」。這種文化的國家主義和學術的國家主義是同樣的要不得。我們的目的不是如何使中國學術獨立，而是使中國學術有新的創作、新的發現、新的貢獻，而在世界學術上佔一重要地位。胡氏的意思也不外此，不過他所用的名詞，我們不敢苟同而已。

遣派學生到外國讀書本來是一時救急的辦法，不是國家長久之計。中國在滿清季世，鑒於外國的船堅砲利，才選派幼年學生去外國留學。這種辦法行了五六十年，不為不久，到現在留學生的數量，日益增多，形成國家一種政策，社會一種風氣，大有一經鍊金，聲價十倍之勢，中國學術之落後，於此可見。留學生對於中國不能說沒有貢獻，胡氏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然而，靠人家的大學為我們造人才，究竟不是根本的辦法。在現在外匯困難的時候，每年消耗四五百萬美元，尤不經濟。根本的辦法還是把我們自己的大學辦好，使優秀學子可以不出國門而能得到與外國大學同樣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們對於胡氏的看法是表十二分的同意的。

就胡氏的談話看來，他所注意的是大學經費的增加。有了充裕的經費，圖書設備，教授待遇都可以改善，自然是發展學術最初碼的條件。但，我們的意見是：設備待遇的重要性，固然沒有人可以否認，如果以為如此便可以使中國學術光輝燦爛，未免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

我們認為中國學術之所以不能發展，是因為中國學術環境的惡劣。這個惡劣的環境的造成至為複雜，舉凡國內局勢，教育政策，社會風尚，和這個問題都有密切的關係。學術的發展需要和平，歷觀中外古今，凡是學術發達的時期大都是在國內有相當的和平，生活有相當安定的時候。前清二百年間的學術以乾嘉為最盛，所以然者是國家承平，社會安甯，人有餘裕以自勵於學。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均有長足的進步，也是因為國內有長久的和平。美國在世界學術上的地位，是南北大戰以後幾十年的和平所賜予的。中國在抗戰以前的十年內，國內雖不是真正和平，但就大體上說，尚有相當安定；因此，各大學的研究工作已經走上了正軌。和平與學術的關係如此。目前國內的局勢怎樣？在這種遍地烽火的情況下，學術是無法發展的。

學術的發展需要自由的空氣，使從事於學術工作的人可以自由研究，自由探討，而不受任何外來勢力的干涉與侵犯。近年來的學術空氣不是這樣。在集中意志的口號下，一切自由探討可能被視為『不正確』或『危險』。你看，幾個大學不是受了教育當局的密令而解聘一大批的教授嗎？這是一個窒息的學術環境，學術之花將要因窒息而萎敗殘謝了，何能放出美麗的花朵來？

目前的社會風尚是陞官發財，陞官者有勢，發財者有力，誰還把書生看在眼裏？在生活困難，救死不贍的時候，學術變成一種不急之務，祇有傻子才從事於這種沒有出息的工作。就是在學術界的人物亦以辦教育行政為高尚，所以一個很有希望的作家，不叫他安心去創作，却要叫他做教育長，一個長於研究的人，却要叫他做校長，這樣，也不知糟蹋了多少學術有前途的人才！

中國學術的落後是一切落後的主要原因。我們不但比不上西洋各國，即與東洋的日本和印度亦不可同日而語，這真是中國的大恥。我們是擁護胡氏以十年的期間，建立中國大學教育的主張的。但僅就設備待遇上着眼還是不夠，我們必須建立學術發展的環境——國內需要和平，研究需要自由，社會對學術應有相當重視。造成這種環境需要在學術界有地位的人如胡氏者之登高一呼，喚起政府，喚起社會，一致努力！



專論

爲新外匯政策擔心！

康永仁

官價匯率的保留，爲新外匯政策本身的缺點。祇是缺點，還沒有關係，若因此缺點，而發生了給予某一部份人以特別利益，那更成爲新政策的污點了。所以我們認爲官價匯率沒有保留的必要。關於這一點，我於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拙作「新外匯政策美中不足的一點」一文中，已有申論，不再贅。

新外匯政策的實施，已經爲時兩週餘。在這兩週餘，黑市外匯的還未消滅，實爲新外匯政策的凶兆。新外匯政策的成敗，就視黑市之能否消滅以爲定。所以黑市之不能消滅，是我們對新外匯政策深爲担心的地方。黑市未能消滅的主要原因，則爲外匯平衡基金會未能認清新外匯政策的基本精神，取得主動，指定銀行又爲本身的利益起見，所商決的購進價格，并非真正的市價。其次則爲走私所需要的外匯，也是黑市產生的原因。

就我們的國際收支情況說，進口管制還不能放鬆，也不應放鬆。因此進口走私，事實上恐難絕對禁絕，走私所需要的外匯，既求之黑市，則黑市之難以絕對禁絕，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於這一點，政府是應當加強緝私，並力求許可及限額分配的合理的，許可限額如能分配合理，緝私如能加強，是對新外匯政策很有幫助的。再則外匯平衡基金會的掛牌匯價，若能接近自然水準，也間接有消滅走私的效力。

外匯平衡基金會的工作，雖爲穩定匯價，但所謂穩定，在物價繼

續上漲的時候，與物價比較穩定的時候，其意義不大相同。在物價比較穩定的時候，所謂穩定，則含有釘住的意義。匯價低於釘住價格時，外匯平衡基金會，則購進外匯，高於釘住價格時，則拋售外匯，俾對外匯價依繞於釘住價格，而不致有大向上或大向下，尤不能祇有向上而無向下的變動。在物價繼續上漲的時候，所謂穩定，應爲相對於一般物價而言，即匯價應准其隨着一般物價而自爲調整，不能釘住，也不應釘住。對匯價之不能趨低祇有趨高，祇要高昇的程度，并未超過一般物價，也應該視爲正常的現象，除非遇有暴漲的情形，平衡基金是不應輕易運用的。這是外匯平衡基金會應有的基本認識，也是新外匯政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外匯平衡基金會要想取得主動地位，以調節市價，并消滅黑市。其所根據的材料，應當爲（一）國內外一般物價的比較，也即國內外貨幣購買力的比較，（二）國際收支的短期及長期趨勢，也即外匯長期及短期的供需情況，（三）國內外商品生產成本的比較。不應爲指定銀行商定後，予以承認而已。惟有這樣，才能取得主動，領導市價并消滅黑市。也唯有這樣才合乎新辦法的精神，避免新政策的失敗。

這兩週多，外匯平衡基金會的掛牌匯價，始終以指定銀行所商決的市價爲根據，指定銀行所商決的匯價，既非根據我們剛才所說的材料，又不是追隨黑市匯價，黑市匯價的不能消滅，實在意料中。又據報紙透露

，新外匯政策施行後，結賣外匯於指定銀行者，並不踴躍。這兩週餘，指定銀行所出售的外匯，還是靠着中央銀行的供應（假手於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中央銀行既還肯供應外匯，則指定銀行所商定的匯價，更無追隨黑市的必要了。因此，所決定的匯價，絕非真正的市價。因為在中央銀行所供應指定銀行所出售的外匯中，很可能有一部份甚或大部份即由指定銀行所附設的進口公司所購用，這樣在中央銀行尚有外匯可供應及未停止供應前，則指定銀行為自身利益計，其所商定的市價，一定要低於真正的市價，這或為市價并非真正市價的真相吧！指定銀行多為商業銀行，商業銀行類多有附設進口公司，它們所決定的匯價，我們不但不能希望它們以我們上舉的三種材料為依據，在中央銀行未停止供應外匯前，我們就是希望它們所決定的匯價為真正的市價也不可得。它們所決定的匯價，就是真正的市價，因走私的所需，還恐怕黑市不能完全消滅，何況並非真正市價呢？這是黑市不能消滅的關鍵。

新外匯政策的成敗，既視黑市的能否消滅以為定，茲黑市既還存在，而存在的原因又如上所述，則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就必須針對原因，迅即有所行動。行動不難，祇要能居於主動的地位，以我們所舉的三種材料，為決定匯價的根據，使掛牌匯率，真的成為標準匯率，再輔以平衡基金的運用，就可以領導市價，并消滅黑市，這是上策。其次，外匯平衡基金委

員會的掛牌匯率，索性可以取消，因為它既不代表真正的市價，沒有意義，還有阻止匯價隨供需狀況自為調整的流弊。取消匯率掛牌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的工作，應以搜集匯價變動的材料，并預測匯價的變動為限。於匯價將暴漲，或有暴漲而暴漲得又不合理時，再出面有所行動，運用外匯平衡基金以調節市價，這是次策。次策以外匯平衡基金并非經常使用，則指定銀行要想賣出外匯，除以市價向市面購進外，就別無來源。因為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取銷了掛牌，也就等於解除了平衡匯價的責任，自然也就沒有運用平衡基金的義務了。這樣則指定銀行的購進價格，可變為真正的市價，黑市自然就要消滅了。同時，取消掛牌的平衡匯率後，指定銀行已無約束，其購進價格可以不必一致，有避免壟斷的效力，也是這個辦法足以使匯價接近真正市價的原因。再則這個辦法，可以節省外匯平衡基金，以最少的基金，即能發揮穩定調節市價的功用。若不此之圖，仍每日掛牌，經常担負着調節的責任，則中央銀行的外匯存底，恐怕很快的就會用完，無以為繼，用完了，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也就完事了。

好的開端，能否有好的收獲，一致的讚美，是不是會落空，一切就看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的認識與運用了。新外匯政策實施已兩週餘，外匯黑市的還未能消滅，是我們深為新外匯政策担心的地方。用特一申所見，希望外匯平衡基金委員迅即針對原因，有所行動。

算八字、看相、與中國政治

邱昌渭

一位美國朋友，新近來到中國，我問他：中美兩國社會情形不同的地方，在他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什麼？這位美國朋友毫不猶疑的答道：在中國算八字看相的先生們非常之多，這在美國是沒有的。

這位美國朋友的觀察很深刻，他把中美兩國的政治，由社會現象所反映出來的特徵，簡直一語道破。

不錯，中國人是相信八字，一個小孩呱呱墮地的時候，他的父母必定要請一位八字先生，替他推算流年——算他從幾歲起運，以後每隔幾年交運、脫運，甚麼時候發財，甚麼時候升官。這本流年，就是一個人畢生升官發財的指南針。除了算八字之外，還有看相、摸骨。有人說摸骨比看相還要靈驗。據說重慶的郭四海（？）他是以摸骨出名，簡直是門庭如市。

，不僅普通的公務人員，就是達官貴人也有不少的前往問津。沒有做官的人，想知道甚麼時候有官做，官小的人，想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做大官，官大的人，則想知道能否榮寵無替，永世其昌。總而言之，爲着升官，爲着發財，大家都請求算八字看相摸骨的專家，指示一番，因爲人們相信，在中國，富貴是命中註定的。

我不否認，算八字看相是一種迷信，但現在的問題是：何以中國人相信八字看相，而美國人——或英國人則不相信呢？有的人說，這是由於我國生產事業，不發達的緣故。一個人爲着要生活，必須有一種職業或技能，而八字先生或看相先生多半是瞎子，雙目不明，爲着要生存，就不得不去做這種職業。這一解釋，我覺得過於膚淺。拿經濟學上供求的原理來講，一種貨品能殼在市場上出售——甚至於銷路很好，必定是由於社會上產生了需要這一貨品的要求，所謂有『求』纔有『應』，否則這家舖子一定會關門大吉。同一道理，因爲中國人相信算八字看相，所以算八字看相的先生們纔應運而生。還有一種說法是由於中國的科學不發達，所以人們纔迷信算八字看相。我對這一解釋，也認爲似是而非。就一般的說來，中國科學落後，誠屬事實，但朋友們中不乏卓越的科學專家，以我所知，這些科學大師，並沒例外——也是向郭四海或仇慶雲去請教，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相信算八字看相，並不是愚夫愚婦之流，而是受過高等教育，飽有學識的人們。

究竟中國人爲甚麼相信算八字看相？我的答案是：由於中國政治不民主的緣故。

民主政治是公開的政治，在民主政治制度下，知識份子的進身，有兩種途徑：第一由於考試，只要資格相合，無論貧富貴賤，皆能參加，英美兩國的永久文官，都經過公開考試得來，一經取錄，便終身爲官，決不能憑着私人的關係，實緣俸進。其次是由於選舉，人們要想做官，只有參加競選，官能否做到手，須根據選民票數的多寡來決定。不錯，民主國家中，還有許多種類的職務，既不憑考試任用，亦不由選舉得來，而是由主官指派充任，但事實上，這些人，並不是由主官一人任意支配，而是在政黨

政治分贓制度的原則下，透過主官，酬勞同黨罷了。

公開與平等是不能分開的，猶如剪刀的兩翼之不能分開一樣，能發公開，必能實現平等——特別是機會的平等。前清是君主專制，但因爲科舉是公開舉行的，所以不論王子、庶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參加。公開與平等的原則，能殼實現，孔夫子所主張『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的道理，也一定能實現。

政治不公開，不平等，就不是民主政治，不民主便是獨裁了。由於政治的民主與不民主，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心理。在民主國家中，大家相信人定勝天，一切事體，人人都有同等的機會去爭取，去追求，只要你有才能，肯努力去幹，你一定能得到應有的收穫。復次，機會平等，還有一種現象，就是在努力的過程中，人們在同一的環境下，自始至終，必須經過同一的階梯。又拿破文官來講罷，人人必須經過公開競爭的考試，考試取錄之後，又必須按照年資的標準，一步一步的升遷，才能達到最高的地位，一個人只要辦事勤勞，沒有錯過，一直做下去，經過若干年月，總有出頭之日。所以外國人相信世界是人爲的，而人力一定能殼制天，這種觀念，在積極的方面，作用很大，因爲人力既能勝天，必然的也能改造政治；政治不良，不是命中註定，而是由於人謀不臧，或制度不善，改造的方法，還是從改變人事，或改善制度下手，以賢者代替不賢，把不好的制度，用大無畏的精神去改善，使之成爲好的制度。這就是達爾文所發明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者敗的一套理論。民主社會之所以有進步，就是這一理論的實現。

相反的，在獨裁政治的國家中，人們不相信人定勝天，而相信聽天由命。在獨裁制度下，政治不公開，而祕密的由少數人在黑暗中勾勾搭搭，遇有好的機會，只有這少數人的子弟、親戚、同鄉、同學近水樓台，捷足先登，局外的人，不獨不能參加，連問信都問不着，而這少數人之所以能居高位，近君側，既不經過考試，又不憑着選舉，完全由於『有關係』！或是親戚，或是同鄉，或是同宗同姓，或是同學，或是學生，追隨日久，相信得過，俗語所謂有歷史。這少數人爲鞏固他們的地位，又不能不用他們

自己的子弟、親戚、同鄉、同學、學生，因為他們也覺得，只有用自己信得過的人纔能放心。

一個國家用人行政，完全憑着親戚同鄉同學的關係，此外別無途徑與標準，於是乎就有幸與不幸的現象發生了。張三無論從那方面講——學問、能力、品行、均趕不上李四，但張三與某某長有關係，他可以飛黃騰達，扶搖直上，而李四呢？甚至一個司書的末職，都找不着，這什麼解釋呢？社會上的說法是，張三的八字生得好，李四則自嘆命不如人！

命運的補救，不是努力，因為沒有『關係』，任憑你怎樣努力，也是枉然。在這樣的國度裏，關係既是命運的主宰，進身的階梯，還是找關係，或想辦法去發生關係。看一看家譜，祖宗三代是否有人與某某長本人，或某某長的先人同過學，同過事，或曾有過郎舅的親誼。查一查老祖宗的原籍，能不能與某某長攀扯得上同鄉的關係。假使在這幾方面，都找不出一點線索，於是奔走、逢迎、拍馬屁、走內線、拜乾爹乾媽種種技巧，就無所不用其極。以期達到發生關係的目的。算命先生不是說過嗎，要命中遇貴人纔有希望。

我們不能武斷一國之內，未必個個都像上面所述的那樣鮮廉寡恥，自然有無數志行皎潔之士，不肯同流合污，以謀取地位。但這些人，由於受了命運主宰傳統觀念的支配，他們不積極的去革命或謀改造，而惟消極的退居林下，或則詩酒自娛，發爲牢騷，或則效法諸葛孔明高臥龍中的故智，期待着運轉鴻鈞，必有劉備其人，三顧茅廬來勸駕出山。至於少數不甘寂寞的份子，則聲色貨利，終至墮落喪身爲止。這當然是社會上的莫大損失，但命也運也，其奈之何！

關係決定人生的命運。所以每一個人都窒息在各人有關係的小天地中圖生存。由於各人的關係不同，便形成了若干的小天地，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因爲關係的本身，就是有限制有範圍的。同鄉關係受地理區域的限制，親戚關係受血統與姓字的限制，同學關係以一個學校爲範圍，師生則除空間的限制而外，還有時間的限制，中國人喜歡成立同學會，就是找關係的證據。朝廷中有了各種不同的小天地

，自然會發生利害衝突，互相傾軋的現象。這叫做朋黨之禍。起初的時候，尙是暗鬥，後來皇帝知道，不受譴責，便變爲明爭了。晉世祖武皇帝的時候，有這樣的一件事：

『賈充爲司空尚書令，領兵如故，與侍中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事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廷各有所附，朋黨紛然。帝知之，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等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資治通鑑七九卷二〇頁）

賈充任愷朋黨的鬥爭，算是通了天，通天之後，未受處分，便更無忌憚。歷史是事實的循環，這類的事，當然不限於晉武帝的時候了！

關係論的特徵，是連鎖式，而不是波浪式，一環套住一環，特別是姓字血統以及裙帶的關係，例如兄弟的兄弟，或小舅子的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造成有關係的關係的關係。但事實告訴我們，有關係者未必有能，有能者未必有關係——甚至不願意發生關係。一個國家的政治，鬧到這步田地，一定發生兩種現象：一種是違反達爾文的進化原理，以不才統治有才，產生優者敗，劣者勝的畸形發展；一種是失敗主義者的濫觴，有才的人，由於缺乏關係，或屈居下位，或退居田園，自怨自艾，喪失自信，終至自甘暴棄爲止。

一個人的事業前途，相信是命運，必然的，國家的興替，也就不能不靠着命運了。算命看相以及摸骨的先生們，你們的生意正朝着興旺的道路上走着咧！

八月三十日於南京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英國的社會安全計劃

吳景超

英國倫敦的窮人，其所以貧窮的原因，倫敦大學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曾有一個詳細的調查。根據這個報告，我們知道失業是貧窮最主要的因素，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其貧窮是由於失業。有四分之一的人，其貧窮是由於家中賺錢的人生病了、殘廢了、或者死亡了。還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其貧窮由於薪金的收入，不够維持其大家庭。這些人，假如子女少些，便可以在貧窮線上過日子。餘下來的人，其貧窮由於年老，謀生的能力已經沒有了，手邊又沒有儲蓄，只好在貧窮線下，度他的餘年。

失業、生病、殘廢、孤寡、年老、大家庭，這些都是工業社會中一個人可能遇到的危機。只要有一種危機來到，生活程度便會動搖，原來生活過得相當舒適的，在危機的打擊之下，便會跌入貧窮的深淵。近來英美人士所提倡的社會安全計劃，以及羅斯福總統所主張的不虞匱乏的自由，就是想創造一種社會制度，使在這種社會中過日子的人，不受這種危機的威脅，使大家都可以永遠的過舒適的生活，即使遇到上面所述的任何一種危機，其生活程度，還可以維持於貧窮線之上的水準。

這種企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一種有遠見的人，想創造一個社會新天地。在二十世紀以前，沒有一個時代，貧窮是被人類所克服的。現在，由於科學的進步，生產力量的突飛猛進，先進的國家，覺得這個永遠跟着人類社會的敵人，現在已經可以把他一脚踢開，使他不再來擾亂人類生活的安寧了。英國便是第一個做這種企圖的國家。

在第二次歐洲大戰還在最高潮的時期，英國政府，便以保障社會安全，為戰後施政的中心計劃。在一九四一年，便派了一個委員會，在俾佛利支爵士的領導之下，研究英國的各種社會保險及其附屬問題。經過一年多的研究，俾佛利支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發表他那震動全球的俾佛利支計

劃。一九四四年九月，英國政府發表白皮書，表示政府願意採納俾佛利支的建議，於戰爭結束之後，便要把建議中的要點，付諸實施。白皮書中所提出的辦法，其要點如下。

第一、英國以前的各種社會保險，現在一律合併，或為一種綜合的社會保險。過去社會保險的名目繁多，如失業保險，健康保險，老年保險等等。現在將舊有的名目，一律取消。每個工人，只保一種綜合的險，每星期男的付保險金三先令十辨士，女的付三先令。僱主另外還要替男工付保險金三先令，替女工付二先令五辨士。每個工人，每星期只須在保險證上貼一次印花，手續便算完畢。

第二、保了險的人，從出生到老死，可以在政府那兒得到各種的津貼，以渡過生命中的各種危機。津貼的種類，主要的有六種：(a)失業或生病，如係單身，每星期可領津貼二十四先令，如已結婚，可領四十先令。(b)因工作而受傷殘廢的，在最初十三星期內，其所得的津貼與病人同。十三個星期以後，其所得津貼，等於平日薪津三分之二，但每星期不得多於六十先令，也不得少於四十先令。(c)未達退休年齡便死亡的，寡婦可領津貼十三星期，每星期三十六先令。孤兒可領津貼，每星期十二先令，到十六歲為止。(d)生育津貼，一次付給四磅，如生育的母親，也是就業的，在生育前後十三星期內，每星期可得津貼三十六先令。(e)男子六十五可以退休，女子六十可以退休。如係單身，可得退休金二十先令，如已結婚，二人可以合得三十五先令。(f)死亡可以得喪葬津貼，三歲以下的得六鎊，三歲至九歲得十鎊，十歲至二十歲得十五鎊，二十歲以上得二十鎊。根據過去英國社會保險的經驗，保險費及津貼，都不是固定的，可以因物價或其因素變動而更易，所以這兒所述的數目字，并不是永久

不變的。但以保險來應付生命中危機的一個原則，乃是不變的。保險者所得的津貼，并非完全由他所交納的保險費中支付，因為專靠保險費的收入，決不夠來推行這樣偉大的社會安全計劃，此點我們在下面當再加以說明。

第三、政府除在保險基金外，還設立一種救濟基金。凡領取津貼之後，還不够維持生活的人，可以從救濟基金中撥款協助。

第四、與社會保險并行的，還有一種義務醫藥制度。凡是英國的公民，都可以選定一個醫生，作為他的家庭醫生，到他那兒去看病吃藥，都由公家花錢。假如醫生覺得病人得往醫院診治，他便可以介紹他進公立醫院，在醫院中所花費的一切，也由政府負擔。

第五、大家庭既然是貧窮的一個原因，所以英國政府，決定凡生育子女的人，自第二個子女起，每星期可領家庭津貼，其數目為每一小孩五先令。懷孕的母親，可以在生育之前，到醫藥中心大廈，或地方政府所指定的地點，去時受診察，以保障生育的安全。地方政府，還要指定若干護士，輪流的到有嬰兒的家庭中去訪問，給做母親的以教育子女的衛生常識。

第六、以上所述的社會安全計劃，在一九四五及一九五五年的花費，政府曾估計如下：

項 目	一九四五年 (單位百萬鎊)	一九五五年 (單位同上)
退休金	一九四	二〇三
其他社會保險津貼	一六九	二〇五

其他社會保險津貼	二〇五	二二五
救濟基金	六九	七三
家庭津貼	五九	六〇
義務醫藥	一四八	一七〇
總 計	六五〇	七三一

英國在一九四五年的整個國民收入，為一〇、一九一百萬鎊，所以社會安全計劃所花的錢，等於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六點四，這是一個相當沈重的負擔。在六億五千萬鎊的總數之中，由保險費中支付的，只有二億八千三百萬鎊，等於整個社會安全計劃所花的錢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五。其餘的部份，也可以說是社會安全計劃所花的錢的大部份，是由國庫負擔的。我們還要記得，就是那二億八千三百萬鎊，也只有一部份是工人坦貢的，將近一半的保險費，是由僱主代付的。所以英國的社會安全計劃，也可看作一種均貧富的方法，由富人那兒提取一部份的資金，加上工人自己所交納保險費，來辦社會福利的事業。我們更要記得：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有一種弊病，是消費不足。消費不足的原因，并非人民一切的慾望都已滿足，而是由於人民的購買力不够。社會安全計劃，又是一種提高消費的辦法，其作用在減低儲蓄，加增消費，其效果可以使全民就業的理想，易於維持，高水準的國民收入，易於達到。

我們希望英國這種計劃成功，為人類社會開一新天地。

八月、六日、清華園。

台灣島與台灣海峽之地位價值

沙 學 浚

台灣島形如芭蕉葉，懸浮於東海南海之間；沿着經線看，他是東亞花綫列島南端的一節，以北有琉球、日本、千島、阿留申諸島弧；順着緯線看，他屬亞洲四排弧形斷裂綫最東的一排，西面的三排是「中國東南海

岸」（很像用圓規所畫出的那樣圓）、「川黔」、「康藏」三弧形，由西向東，一排低於一排，台灣為最低。台灣海峽及東海黃海水深不足二百公尺，是亞洲的「大陸基盤」，台灣東三十至五十公里以外即為二千公

尺深的海水，而以東一百五十公里便是六千公尺以上的深海，（琉球海溝最深，七一二公尺）這種種說明台灣是亞洲大陸與太平洋「本部」之間的界限，而台灣海峽是東海黃海區域（包括海島與海岸）到南洋羣島間的門戶。

對中國，台灣是邊緣地位，在整個東亞海面上（指東海黃海及南洋），却是中央地位。由於是邊緣地位，歷史上的台灣，是神祕、隔絕、孤立、化外，對於中國有時成為弱小政治勢力的退守區域，例如鄭成功建東都國於此。由於是中央地位，大發現時代後的台灣，地位價值與時俱增，十七世紀，荷蘭人據台灣（重心在台南），為中國日本及南洋間的轉口貿易港，以後隨時有強國曾經或企圖加以佔領。但在大發現時代以前，這種地位價值並未表現出來，這由於台灣島上的氣象及海岸情形不易明瞭，而航海以沿海進行為宜，福建海岸又適於航行與停泊。

從海上交通言，台灣海峽更重於台灣島，此海峽寬僅一百三十四公里，具有通過地位，和良好的封鎖地位。遠東海上航行必須經此海峽，而不能繞道台灣之東，因台灣島東部海岸大部分平直陡峻，少港灣，更無良港，不能適應航海的要求。台灣島與台灣海峽是海陸構成的中國地理空間的一部分，中國掌握此區，東海南海才能聯成一體；這是中國海權成立的地理基礎。

台灣島與澎湖列島是「岸前島」，對於浙西、福建、粵東的海岸，具有屏障的地位，相當於百慕他島對於美國東海岸，錫蘭島對於印度南海岸。台灣如被外國控制則成為海疆的威脅，禍患泉源，明代倭寇及此次抗戰可為著例。

現代中國的南洋航線，與過去「揚帆南越」的「通夷海道」不同，它不僅是海上南北交通動脈之南段（元明清三代「海運」專指北段——江南到渤海沿岸——而言，南段不重要。）不僅具有「國內交通」的性質與重要性，同時是南洋以西各國和北太平洋各國之間的聯繫者，具有「世界交通」的重大意義。這條南洋綫必須經過台灣海峽。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太平洋航空綫與中國航空網之間，台灣是一個重要的聯絡站——上海與馬

尼拉航空綫上的中點。

台灣島的石油田，大部分在西北部丘陵地，小部分在中南部，戰前已經出油的油田，在新竹縣南的「出礦坑」，雖然產量不多，但發展希望頗大，戰爭期中已經增產。台灣又有工業體系和米煤等重要輸出，六百五十萬的人口需要種種省外輸入，資源豐富但不能自給的台灣島，必須與大陸維持密切的貿易關係，因而需要海上運輸，以滿足這種要求。

台灣島有三萬六千方公里的面積，是一個近陸而面積較大的島，有完備的人文地理的和交通地理的結構，而其海港如基隆高雄等有本島的空間做後方，在全國國防地理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反觀面積太小的島如太平洋中的瓜加林、帛琉、等地位孤立，本部無出產，人口少，一切防守的力量自外面來，自遠方來，自然攻易而守難。另一方面，大而積的島嶼如新幾內亞——世界第二大島——內部高山密林，縱橫隔絕，榛莽一片，人跡稀少，沒有地理結構可言，除沿海航行外，各港間之聯絡全靠船舶。這種大島實缺乏陸地性，防守亦極困難。這樣比較就可看出台灣島具有陸地性而便於防守，是很有價值的了。

在歷史上，軍事重心常在澎湖，凡由南方或福建南部海岸進攻台灣者，必先佔澎湖，如一五九及一六二二年之荷蘭人，一六六一年之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一六八二年清水師提督施琅（攻鄭成功後裔），一八八四年法將右柏，反之從台灣或海上進攻福建及粵東沿海，亦以澎湖為巢穴，例如明代倭寇及清代海盜。

澎湖列島居台灣海峽之中央，西與廈門金門兩島，東與安平（台南之外港）高雄兩港遙相相應，只須有相當的防守力量，便可封鎖海峽之南口。海峽南口的軍港在澎湖的馬公，而不在高雄安平（十七世紀荷蘭人以此為商埠），不僅因前者居海峽之中央，同時因其海港地理條件，尤其是港闊而水深適度（太淺太深都不宜）適於作軍港，為高雄安平所不及；但其缺點是出產太少，孤懸海中與台灣及福建之聯絡均須經過海面，對中國國防言，將來的重要性不及位於大陸邊緣的廈門、金門兩島，或台灣島上的軍港。

台灣海峽之北口沒有「海峽島」，控制海峽的基地在海岸上：西有福州及三都澳，東有淡水及基隆。福州乃甲午以前，中國南方唯一軍港，港內要塞早於中法之役被法軍破壞，其缺點為水淺港狹而出口（閩江下游）曲折，不能適應現代海軍要求（抗戰期中，日人三次佔福州三次離去，對於廈門金門南澳三個深水良港，一開戰即佔領，從未放棄。）三都澳在清末義美兩國會要求或企圖租借，地理條件略同廈門，迄今並未建設，故不重要。淡水港十九世紀及以前，極為重要而繁榮，十九世紀且為條約港之一，其衰落原因與福州略同。故日本佔台灣後，即積極經營地理條件優越

之基隆，作為商埠與軍港。今後中國控制台灣島與台灣海峽之北口仍當以基隆為中心。

在過去，台灣島與台灣海峽的關係，非常或比較疏遠，在近世及今後，因海權與空權的發展，兩者的關係日趨密切，永不可分。從地位價值及沿海防守言，台灣島、台灣海峽及東南沿海與近海各省，共同構成「一個」地理單位，因此，需要建築兩三條鐵道，從華中和江浙直達福建海岸以與台灣相聯絡相適應，以補海上交通的不足，並使大陸與海島接成一體。

大上海都市計劃（書評）

張繼正

書名：大上海都市計劃總圖二稿（非賣品）

編印者：上海市計劃委員會

出版日期：三十六年五月

上海市政府邀集全市市政與工程專家以及各界有名人士組織委員會，商討研究，費時兩載，開會五十餘次，完成這本「大上海都市計劃總圖二稿」。內容周詳，為全國所僅有，我們除了敬佩參加工作諸位先生之殫心竭力而外，實在不敢再多置一詞。但是在現實主義者，尤其是在飽受上海都市生活壓迫的小市民的立場看起來，終不免有畫餅充饑，望梅止渴之感。

都市計劃的藝術，自古就有，而都市計劃的名詞，却是近代才成立的。近代都市往往受着人口的增加，或社會環境的變遷，使原來的都市性達到飽和點，以致不能再有發揮的力量；都市計劃的目的，就在解救都市當前的病症，和控制將來的發展。就目前的上海來說，交通的阻塞，房荒的

嚴重，努力的供過於求，物資轉運的遲緩，在在表示着人口的過多。再加上房屋建築的不合用，街道的狹窄，交通工具種類的艱難，市區與郊區交通的失調等等，成為世界上最亂七八糟的大都市。因為如此，所以犯罪行為的增加和疾病的傳播，威脅着全體市民的安全。現在的上海實在還是三十四年以前一百萬居民時代的都市，現在硬叫牠來容納四倍的人口，焉得不亂？如果上海人口的增加，依照負責計劃各位專家的推測，五十年後，要在一千五百萬以上，（是否可能達到這個數目，我們暫且不論，但是初期的增加，是自然的現象。）那時候的亂，更是不堪設想。「大上海都市計劃總圖二稿」的深謀遠慮，想要控制上海將來的發展，確值我們佩服。但是很可惜的是它對於上海目前許多嚴重問題的解決，却付之闕如。

上海目前都市設計的病癥，在發展不平衡，原因是過去有租界的存在，外國人固然專心致力於自己租界的繁榮，我們中國人也因為租界有種種特種和便利，都集中到租界裏來，幫助繁榮租界。閘北、南市、江灣、浦東，始終落後的原因就在此。現在租界已經收回了，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租界的意識還沒有完全泯除，一切設施，好像還有這個界限的觀念在作祟，譬如說修馬路，舊日的租界佔優先地位，管理交通，舊日的租界得到首位補助，公用事業，亦以舊日的租界最為便利。這個固然是因為舊日的租界區內，人口最密，需要最切，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正是因為沒有兼顧到界外的建設與發展，所以舊日的租界還是享有優待，住在舊日租界裏面的人，還比住在界外的人得到較多的享受和便利。結果是舊日的租界依然領導着上海的繁榮，同時亦領導着上海的擁擠。

人是經濟的動物。總會計算的，如果我們希望上海的市民向舊日的租界之外去疏散，我們先得替他們打算一下。他們疏散出去之後，是否比擁擠在舊日的租界之內合算？答案必須是「是」，然後這個希望才能實現。否則，等於夢想。戰前爲了想開發江灣市中心區，當時主持計劃的人，就先開闢江灣市中心區的馬路，鋪上柏油，並且預先規劃着種種近代都市必備的公用設備，使該區住家的人除了有一個比較安全愉快的居住環境外，還同樣能享受到租界內所有的種種便利。這就是他們懂得替市民打算，首先具備這些條件，然後才能吸引人去住，才會有人去投資建設。若是僅靠幾張燦爛美觀的計劃圖，決不足以廣招徠。可惜是侵略戰爭發生，把這個計劃摧毀了，我們沒有能够充分看到牠的成效。

當時江灣市中心區的開闢，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上的意義，就是希望把上海的重心，從當時的租界區裏，遷移出來。現在租界既已收回，這一個計劃是否有繼續執行的必要，自要重新根據上海市全盤的形勢來考慮，決定，我們不必在這裏多加討論。但是這個經驗却是值得現在談上海都市計劃和建設的各位先生的注意。我們且不必好高騖遠，修談增建速度可達每小時九十至一百公里的快車道，來解救交通的擁擠，或爭辯越江交通，應該利用橋樑，或隧道來減低市區人口的密度。我們祇要把當年建設江灣市

中心區的步驟，先用來恢復建設閘北和南市，再開闢江灣浦東，那麼，上海的擁擠或者可望減輕。其他的一切市政困難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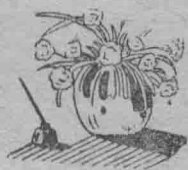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切盼計劃委員會能够再就輕而易舉者做出一套立即可以兌現的計劃來，譬如說，南市的電車怎樣能早日恢復，閘北的電廠怎樣能早日擴充，浦江的輪渡怎樣去改善，各該地區的馬路怎樣去修整，自來水怎樣去供應，學校和衛生機關，怎樣去添設，住房怎樣去增建，市政府應馬上按照這個計劃去實施。

再就舊日的租界本身來說，亦迥非昔比，例如下水道的淤塞，在高潮的時候，潮水會倒灌進來，從地勢低處的陰溝洞裏冒出，淹沒馬路，大雨的時候更爲嚴重。糞便垃圾的處理，沒有通盤的籌劃，常使在人烟密集的地方，放射惡臭，散播疾病。交通管制不良，加重了運輸的遲緩。諸如此類的病症，都是目前全體市民切膚之痛。但是如果能下決心來改善的話，却都是比較輕而易舉的事，祇怕是負責計劃的當局，崇尚討論偉大的計劃，而不屑去注意這些小問題。那末，上海在不久的將來，恐怕就沒有一片乾淨土了。

一個最理想的計劃，不一定就是一個最好的計劃，因為如果沒有實現的可能，那就等於沒有計劃。在目前國家財政快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上海負責當局，不想爲市民謀一點福利則已，如想爲市民謀福利，以上的意見或有參攷的價值。

本刊完全公開，歡迎投稿，論著、通訊、散文、小品，均所歡迎。一經採用，稿酬從豐，并優先付給。

本社啓



文藝

「湖南的西北角」序言

沈從文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我和幾個朋友輾轉回到了湘西沅陵。由北而南一段旅行經驗，已明白全國性戰爭意義。其時南京陷落證實，戰事正慢慢向上延展，集中武漢。洞庭湖澤地帶中國大穀倉的爭奪戰，早在有識者忖度憂慮中。如何動員湖南豐富人力和物資，已是一個重要而緊急問題。湘西就地域言，本是湖南一個單位，二十多年地方人事習慣，即近於割據分治。即此三十縣地方，有時亦不免由二三實力派各自負隅，畫境而守，和外面在某種意義上完全隔絕。抗戰事起，雖最先即有個一二八師參加嘉善國防線的保衛戰，表現極好。不過地方既有個傳統孤立底子，又和三省邊界毗連，人民流動性大，三廳特種民族且剛有問題發生，促成省政上人事新陳代謝。如何處理這一片土地，使之由不安定渾沌局面，進而明朗澄清，成爲一個抗戰重要基地，真值得新接手省政的張文伯主席費一點心！當時最賢明的措置，即沅陵綏署的設立，由對兵役和治安有辦法的人主持其事，並訓練大批青年學生下鄉，作民訓社訓工作，一切事都無忌諱放手作去。這也可說是當局一種大膽的嘗試，因為照環境情形言，這種措置是要決斷和遠見的。若稍有毛病，惡化蔓延影響到抗戰前途，實不堪設想。

我恰恰於這個時期到了湘西。離鄉本已太久，許多問題當然不免隔膜，惟大處却看得清清楚楚。國家正在一個受嚴重試驗階段中，戰事越向上推行，負責當局也必然越加困難。要湘西像個湘西，必需社會安定，可以

作爲學校、工廠、及公私物資的疏散地；還要人心興奮，可以作爲壯丁補給區。那時節在我生長小小縣城裏，即保有千數年富力強的下級軍官，和數萬體力結實性情單純的子弟兵，都閒散在城鄉家裏。其他縣分也還有上萬雜槍散在民間。所謂湘西還有問題，問題也就是這些人的思想和行動！我明白我應當盡的責任是什麼，我明白我對這地方能發作些什麼事。……綏署一成立，我那些大小鄉親，從游移、苦悶、消極、猜忌、複雜情緒中，變成單純而一致的，離開了他們的家，和家中養的毛雞與龍睛魚，離開了果園和磨坊，離開了吃牛頭肉、喝燒酒、打小牌、睡午覺的習慣，以及一切生計事業，帶了自備的槍枝，自備的炊食具和糧食，坐了小船小筏子，快快樂樂集中到沅陵聽候整編整訓了。想起綏署成立，主持其事的陳老先生由省中到沅陵那天，這些自告奮勇的武裝同鄉，一萬人在沿河兩岸歡呼情形，過不久又即分別乘了小帆船向常德集中補充榮譽師情形，真令人永遠眼淚！

十年過去了，這些良善人民，把血肉還給了國家和土地，在民族發展史上，各自盡了能盡的責任，永遠沉默了。我那縣城五千人，每家門口各供奉了個陣亡者的木牌位，那些孤兒寡婦，每當黃昏來臨時，在木牌位前沉默上香，以及此後沉默過日子種種，都彷彿近在目前。我明白那個沉默背後，實際藏了多少辛酸！我覺得還有些責任待盡，因爲那個普遍的沉

默，實象徵中國任何一個城鎮對於和平的渴望。

在沅陵我住了約三個月，所接觸的現實問題自然日益增多。一面是長沙臨時大學、中央軍校、向川滇遷移過境，一面是政治學校、商學院、藝專、湖南大學、以及三十餘公私立中學，及無數國家機關單位陸續向上疏散，對湘西都不免懷着戒心，為安全問題而苦惱。綏署深感責任複雜重大，對物價控制，對房屋分配，對難民輸送，對整個治安強化及糧食兩政進行，也無一不超過想像以上煩雜而多周折。還有些屬於情緒隔離狀態發生的問題，如地方與中央磨擦，本地與外省磨擦，自然更不容易作有效安排。我知道，我還應當為地方為國家作點事，所以到雲南後又寫了一本小書，名叫「湘西」，對地方各方面略加說明，希望家鄉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後來者的同情與理解，能作成一種新的調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氣氛的形成，在當時，實比任何事情還重要。

所以我那本書的題記上即說：「這本書只能說是一點土儀，即一個湘西人對於來到湘西或關心湘西的朋友們所作的一種貢獻。我的目的在減少旅行者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他一些不可避免的好奇心，以及給他一點到湘西為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並希望這本小書的讀者，在捲卷時能對於這邊鄙之地給予少許值得給予的同情，就算達到寫作目的了。若這本小書還可對這些專家或其他同鄉前輩，成為一種拋磚引玉的工作，那更是我意外的榮幸！」在題記上我又還說：「據個人意見，對於湘西各方面的知識，實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門的專家，或是一個較細心謹慎的新聞記者，用「湘西」作題材，寫成他的著作，我相信，都重要而有價值。因為一種比較客觀的記載，它多多少少可以幫助他人對於湘西的認識。」

我的工作並不白費，這本小書直到十年後的現在看來，意義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一個同鄉知識份子，面臨當前地方由於戰爭復員所感到的社會變化和經濟貧乏，以及十年戰爭壯丁犧牲殆盡所形成的種種，引起了他對地方的責任感和無所措手足痛苦時，讀了我這本小書，必然還可得到一點點新生的憧憬，以及對於地方重造所抱的勇氣和信心！

十年過去了，直到我去年回北平時，方看到長沙李震一先生一册有關

湘西報告，真有空谷足音的感覺。近二十年這類遊記作品，大多配合社會發展而產生。就個人記憶所及，民二十以後強敵迫境，范長江先生的「塞上行」，便得到特別成功。記江西瑞金「赤區失陷」景況，陳犀雅先生為申報寫的遊記，也為人所十分注意。抗戰初起，作家從軍日多，曹聚仁、劉尊棋諸先生的前線通訊，次青先生的空戰紀事，和某先生的「台兒莊」、「平型關」戰役經過，「徐州的突圍」，「武漢的撤退」，都給國人一個深刻動人印象。描寫淪陷景象，如「南京半月記」，敘述後方如戚長誠先生寫「臨時大學師生步行入滇」通信，蕭乾先生寫「滇緬路修築」，都可作歷史參考補充讀物，民族在悲劇中的掙扎，亦無不於字裏行間流注。李霖燦先生寫貴州諸洞穴景物，及滇西雪山紀遊，更多發前人所未發。有關後方諸省農村工礦經濟人事作綜合報告，有材料，有見解，有文筆，特別具有教育價值的紀事，尤應數徐盈先生幾年來在西南各省跋涉，所做的一些工作。抗戰後數年，戰局側重在洞庭衡湘一帶，戈衍棣先生的軍事分析報告，足稱代表作品。和平來臨，軍調部進行工作時，趙超構先生的延安一月，用筆有分寸處，令人佩服。國外通信，則自納粹崩潰至聯合國成立蕭乾先生的通信，情文斐蔚，更自成一格。直到最近，東北烽火中呂德潤、張高峯二先生的通信，還是我愛讀的作品。秦晉先生的新疆遊記，材料即豐富，見解又透闢，亦可謂有心人之作。據我私見，這類作品雖有點時間性，依然值得由記者公會或所屬報社為印行單本，作全國性推銷，因為這些作品，實在都比一些雜湊文學作品有骨血、有生命，而又對社會現實富於批評性。即以文章言，也大多明朗而健康，可為習作敘事範本。寫故事由此入手，一支筆即較容易貼住土地人事，得到傳遞效果。

震一先生這個作品，敘述的問題，雖比較偏於一區域問題，置諸上述諸作中，實有其同樣重要性，對於湘西明日重造設計上，尤富參考價值。有幾段稱引湘西風德提到地方政治教育諸弱點，尤其有意義，值得讀者深思，因為那個弱點可能也是湖南全部或中國每一地方都存在而待認識待解決的。所以在這本書付印時，特別寫幾句話附在書末，說說本書和個人工作因緣，並表示個人對於這類作品所具有的良好印象和敬意。

討論

民主時代的「保守秘密」

李毅

拜讀雷海宗先生的「論保守秘密」(世紀二卷八期)一文之後，覺得心裏有一番話說，不能不吐露出來，也許這是沒有修養功夫把它藏匿起來的緣故。

我們很贊同雷先生所說戰時要人行蹤的軍事秘密，也在「沒有秘密」的傳統中洩露了，軍事是權力的殺門，兵法上早就有了「兵不厭詐」「虛虛實實」的教義，我們當然不應該洩漏軍機。況且，軍律之下，一切只有服從，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都會取得合法地位，唯獨軍人罷戰，就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要受到反叛的裁判，軍事上根本要求人人放棄若干權利與自由，而絕對服從於命令的，如果偏要去談論軍事秘密，那你是「不識相」，活該要受到軍法的譴處了。

軍事是有其絕對「保守秘密」的獨特性質的，已如上述。但是我們對政治上的「保守秘密」，就不能無保留地附和；反之，我們要求政治積極趨向公開的。在民主潮流澎湃的今天，國家事情什麼不可以公諸全體人民。試看英美政府，在議會中那種公開的精神，尤如英國議會中那次的工黨「叛徒」，在認為政府

外交政策有錯誤之處，就不顧自己的黨是執政黨，遽爾公開抨擊外交政策，當時他的政府代表的外長正在國外參加外交會議，這件事情照理應被認為影響政府信譽而視作秘密，但事情却詳細的發表在報紙上，這種精神確使我們非常欽羨。當然，我國落後是無可諱言的，無法跟英美來比擬的，不過我總以為得朝這方位走，在比較中來尋求進步。因此，我們對於贊成七月的參政會駐委會，那種「保守秘密」的態度是不能不起懷疑的。參政會的所謂「若干新聞都已洩漏，不惟影響駐委會的信譽，使今後各政府首長出席報告時，有所顧忌，不能暢所欲言」，我們因為無從知道所謂機密報告被洩漏了究竟是指那些，因也無從知道那些被洩漏的機密資料究竟又是應不應該「保守秘密」，但是，我們可以意識到的：是將國家大事昧瞞了全體，而只由極少數的代表去開去問，最低限度可以說有這樣的趨向。其實，假如是一個真正的民意機構，它應該對全體人民負責，就是所得到的什麼報告，都要有公諸全國人民的義務，從而聽取輿論來一個公平的批判，判定它的好或壞，而轉達政府辦理。那才

真能代表人民意思，也唯有這樣，才可以把民主精神澈底表現出來。現在憲政時期即將開始了，幾個月後，憲法也就要施行，我們切切盼望着：政治的民主要建基在公開的上面，而不要把國家大事，顧忌人民而不敢暢所欲言！

現在，我們再從個人關係來看「保守秘密」，我一向有着一個觀念，就是「憑着『誠』去揭露每個人的是非，係絕對進步的行為，這樣可使『是』的加勉，『非』的改過。這個觀念如果是不錯誤的話，我們願把它當做基點和前提去看「保守秘密」，到底是「是」或是「非」？

秘密的定義既是「說出一切公事，就是瀆職，說出朋友私事，就是賣友」；那麼二個人或很多人對坐的時候，不是啞口無言，將是拉天扯地，談說些今天天氣真好的話，無怪乎「閒談莫說人非，靜坐常思己過」，「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關己，已不關心」與乎「隱惡揚善」……都成為我國的名言警語，而且也使人會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但是，人的本性總是喜歡與自己以外的人傾吐一下，